

## 20 世纪中国主要文化思潮之概览

方 光 华\*

内容提要：20世纪，中国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出现四个文化反思的高峰，涌现出三民主义文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自由主义文化思潮，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四大主要文化思潮。四大思潮同行并进，各成体系，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取得了主导地位，但其他文化思潮并未绝迹。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同时需要汲取其他文化思潮的精华，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贡献中华文化独特的理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三民主义文化思潮，自由主义文化思潮，保守主义文化思潮

—

20世纪的中国，有四个文化反思的高峰：辛亥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改革开放时期。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引发了近代第一次民族文化的大反思。康有为在对传统经学进行反省的基础上，提出“公羊三世”进化史观，认为《春秋》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即是说每一世都有相应的政治制度，君主专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今之世，要顺应时代变化，推行君主立宪。严复把西方“物竞天择，适者

---

\*中国西安市副市长，中国西北大学教授

生存”的进化论介绍到中国，并用进化法则讨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认为只有遵循进化法则才能救亡图存：“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sup>1</sup>。”梁启超发表《新民说》，指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精神。……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而要培养此根柢，“舍新民未由”，办法是“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谭嗣同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和封建等级观念进行了猛烈抨击，呼吁“冲决网罗”。他引用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主豪言：“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sup>2</sup>。”号召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第一次民族文化的大反思使革命思潮迅速走向高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民主主义的先行者，面对外不能为民争权，内不能为民谋利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产生了激进的推翻清王朝的主张。“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也<sup>3</sup>。”孙中山提出用三民主义来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即通过排满革命和反帝救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民族主义，以“主权在民”“权能分治”“建国三阶段论”为主要政治设计方案的民权主义，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创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落后的中国处于亚洲觉醒的前沿。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列宁在俄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揭示出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条件下同样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由于辛亥革命未能把封建制度同它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联系起来，没有打破君主专制赖以生存的基础，更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建立的政权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五四”时期，文化反思进一步引向深入。胡适等人指出：西方科学和民主的文明代表人类文明共同的发展方向，中西文化之别根本是古今之别，中国文化还有十分浓厚的古代色彩，必须将民主与科学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旗帜，老老实实向西

方先进的国家学习。李大钊等翻译出版了一批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指出必须从经济制度这个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主张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孙中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酝酿国民革命。而梁漱溟，张君勱等则认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是回到孔孟儒学的传统中去，用传统文化的真精神来整合乡土社会。“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的第二次民族文化大反思，使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新三民主义文化思潮，自由主义文化思潮，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开始形成各自的阵营。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危机引发了近代以来第三次民族文化的大反思。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新民主主义，认为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必须动员人民，保护人民的利益，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只有将民主，民生与民族自由统一起来，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强调将抗战民主发展为建国民主，发展为有更高实质内容的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民主）的文化<sup>4</sup>”，认为当时文化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文化与帝国主义殖民文化。迫于外敌入侵，民国政府大体上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确定的三民主义路线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用中国传统精神凝聚民心，开展文化复兴运动。但随着抗战走向胜利，国民政府又走上了违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自由主义者陈序经在其所著《中国文化的出路》（1934年）和《东西文化观》（1937年）中依然认为：“非彻底和全盘西化，不足以自存。”1935年3月，胡适在《独立评论》上撰文声明，“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中国的问题是对西方文化学习不够。而贺麟则提出了“文化救亡论”，认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危机说到底就是文化的危机，中国要摆脱民族危机，根本的出路不在于“全盘西化”，也不在于将中国沦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而

在于提升或彰扬儒家文化，即“儒家思想的新开展<sup>5</sup>”，儒家的复兴才是民族复兴的“本”和“源”。冯友兰先后写了六部书：《新理学》（1939年），《新事论》（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5年），《新知言》（1946年），总称“贞元之际所著书”，力图为民族振兴开出一条新路。

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新三民主义文化思潮，自由主义文化思潮，保守主义文化思潮都已经具有异彩纷呈的理论系统，但最终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非马克思主义<sup>6</sup>。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科学的思想武器。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唤醒人民的主人意识，民主意识和平等意识，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不但赢得民族独立，而且通过与资产阶级政权的决战，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权。

改革开放带来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反思的第四次高潮。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迅速完成了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造，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完成了对官僚资本的剥夺，将它们收归国家所有，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1953年，中国共产党又创造性地领导人民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经济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工业生产资料公有制，通过农民的合作化生产确立土地集体所有制，从而使人民成为社会生产及社会财富的主人，确立了社会各阶层在经济权益上的法律平等。政治上通过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人民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真正主人。通过实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各民族的平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文化开启新篇章奠定了基础。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并没有积累充足的社会物质财富，如何迅速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成为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思想认识上的分歧。1957年后，受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所影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被引入人民民主政权内部，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各阶层虽然具有法律上的经济权益平等，但要实现事实上的平等还有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当今时代，社会主义也离不开与资本主义的联系，需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中国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并强调要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提出加强对中华文明智慧的总结与提炼，主张将富有中国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智慧以世界其他文明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开来，促进当代中国自身发展，推进世界全球化进程。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批判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也开始复苏。学术界开始了对胡适的重新研究和评价，对殷海光的介绍和认识，对顾准的发掘和推出，以及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新一轮引进和传播，形成了自由主义研究的新热潮。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王元化，李泽厚等通过大量论著，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自“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进行全面反思，一方面继续其自由主义理想，另外一方面力图确立自由与文化传统的联系。随着1989年“六四风波”的结束，文化自由思潮在总体上淡化了其激进色彩，转向支持市场经济，把对国家政权的批判转向以法制分权，经济自由为内容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与国家政权的契合点，也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与此同时，保守主义文化思潮伴随着“文化自觉”思潮，主要依托“国学”再度兴盛，要求从传统文化的主干，甚至从儒家经学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根脉，一度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

## 二

中国百年文化思潮总体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三民主义文化思潮，

自由主义文化思潮，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四个潮流来进行概括。

三民主义文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都属于革命文化思潮。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有一定超前性的三民主义思想，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创立了中华民国。三民主义成为辛亥革命和国民大革命时期的主要指导思想。孙中山以后，民主革命思潮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坚持的三民主义文化道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三民主义文化思想不断蜕变和退化。抗战期间，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精神有所恢复，但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后，新三民主义思想遭到抛弃。国民党败退台湾后，20世纪50-70年代台湾基本延续了文化专制政策，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1970年代末，随着台湾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台湾本土政治力量的上升，中国国民党执政理念出现重大转变，三民主义文化体系逐渐转型为自由主义文化体系。

一条是以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文化路线。李大钊等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欢呼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一道进行国民革命。在蒋介石背离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精神后，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实践的进一步丰富和对中国历史特点，中国社会性质的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传统相结合。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sup>7</sup>”。他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出了全新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推进社会主义思想在人民头脑中生根发芽，马克思主义读书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整风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激进的文化革命路线风起云涌，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1979年，人们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自由主义文化思潮发端于严复，因其把西方经典意义上的自由理论较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他被称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文化思潮之父。自由主义文化思潮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最有影响的是陈独秀，胡适等早期《新青年》派，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成为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坚定代表。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思想文化论战是其表现形式，经过“东西文化论战”“科玄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整理国故运动”“全盘西化运动”以及“古史辨派”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清理，自由主义者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的主张和态度。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以储安平为首的《观察》群体是其核心力量。第五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夕，这段时期的自由主义文化思潮主要包括两条线索：一条是大陆的储安平，罗隆基，章伯钧，顾准等人，他们积极建言献策，但其自由，民主以及发展市场经济的主张，并不符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另一条线索是海外的自由主义文化思潮，主要是台湾的胡适，殷海光，雷震，夏道平，许冠三等人，也就是《自由中国》群体，起初他们支持国民党，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大肆污蔑和攻击，但是随着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倾向日益明显，他们开始转向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最终被国民党镇压。第六个阶段是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思潮，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在李泽厚，王元化，李慎之等提倡的新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个人自由，宪政民主，市场经济等自由主义思想重新浮出水面；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自由主义文化思潮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相契合，其经济自由的理论得到了积极宣传；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通过与新“左”派的争论，自由主义者对自由的价值，理论根基，哲学基础等文化自由思潮的核心理论进行了深入阐述和系统介绍。

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经历了一个由出现，发展到繁荣的过程。依据时间顺序，这个过程可分为体用论阶段，国粹主义阶段，东方文化主义阶段，现代新儒学的心性学阶段，以及大陆国学热阶段。这一思潮的主要节点有洋务运动中的“中体西用”思潮，康有为等为代表的孔教运动，章太炎等为代表的国粹

运动，杜亚泉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吴宓，梅光迪等为代表的学衡派，张君勱等为代表的玄学派，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王国维，陈寅恪等为代表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十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派，辜鸿铭，章太炎，马一浮等为代表的文化复古思潮，此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在大陆及海外发展的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成中英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第一，第二阶段，第二代，第三代四个阶段的现代新儒家，新时期大陆兴起的以季羨林等为代表的国学热等。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并不是一种具有贬义的思想模式，而是一种对待文化态度相对比较温和的文化倾向。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断裂的文化，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着世界先进文化的地位，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定存在着一些真谛，这些真谛被我们的祖先发现并利用，但这个真精神现在却被我们忽略或抛弃，从而使我们舍本逐末，走上歧途。只要找回这些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真谛与真精神，重新回到正道，我们就能逐渐恢复中华民族的荣光。他们通过对民族文化自身发展，演变历史的客观研究，展示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总结规律，寻求中华民族的真精神，以解决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保守主义者没有将视野完全限定在传统文化一个方向，他们对西方文化也表现出了积极吸收和消化的态度，认为外来文化对固有文化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与促进作用，应该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优胜之处。他们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的立场，认为在建构新的文化模式时，还是应该立足于本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再合理吸收融合外来优秀的思想文化因素，这样“熔于一炉而治之”形成的思想文化模式才是最科学理性的思想文化模式。

### 三

百年来的文化思潮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始终不忘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根本宗旨。

孙中山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都很自觉地抓住“中华民族复兴”这一主题，将其塑造成带有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1916年，孙中山在《规复约法宣言》中谈道：“吾国有六千年文明之历史，有四万万之民众，地大物博，人习勤劳，加以尚慈善，好和平，善服从之诸美德，苟见发挥而光大之，则民生日遂，国度日昌，可操左券而获<sup>8</sup>。”因此，“中华民族为一伟大之民族，必能完成伟大之事业也<sup>9</sup>”。“九一八”事变后，1934年蒋介石出版了《复兴民族之要道》一书，同年还出版了他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稿《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与此同时，国民党要员胡汉民，阎锡山分别出版了《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和《复兴民族须先复兴发展富强文明的原动力》等书和演说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陈诚则将“抗战时代”视为“一个民族复兴大时代”，他的这种论断得到当时许多人的认同。国民党党政要员的这些演说或论著都曾作为宣传材料一再印发给学校，社区和单位，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917年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即指出：“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1937年9月，张闻天和毛泽东联合署名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的指示》中，明确写道：“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进行不懈的努力与探索。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强调文化繁荣与振兴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sup>10</sup>。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sup>11</sup>。”中国

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对于繁荣与振兴文化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征程中的重要作用，更是予以高度重视，并从世界发展潮流，中外历史经验等方面予以阐述。2013年8月19日，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sup>12</sup>。”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他指出：“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sup>13</sup>。”

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严复于1898年翻译出版了《天演论》，用“自由”“民主”的理念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和君主理论。严复认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sup>14</sup>。”由于自由的缺失，导致了中国的落后以及与西方诸多观念的差异。严复还深刻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认为法治是民主的保障和基础。胡适在1931年《文化的冲突》演讲中指出：“我自己的态度是，我们必须无保留地接受这个现代西方文明，因为我们需要用它来解决我们最紧迫的问题：贫穷，愚昧，疾病和扰乱。”陈序经在1930年代也指出：“西洋近代文化之所以能于二三百年内发展这么快，主要是由于个性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提倡。”这是西方发达的主要原因，他主张“全盘西化”。但不管是严复，胡适等人如何提倡“民主”“自由”与“科学”和“全盘西化”论，他们的内心无不激荡着民族复兴的情怀。

保守主义者认为，文化是民族独立，社会发展，国家振兴的基础。20世纪初，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认为，国粹是立国之本，国粹是一种“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一再强调：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必须以中国的伦理道德为主体。到了三、四十年代，冯友兰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在工业化方面要开新，在道德方面要继承。现代化只是知识，技术方面的事情，基本道德是不可变的。20世纪90年代，余英时，汤一介等学者在反思近

代以来直至8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的基础上，致力于重塑儒家思想的形象，并就儒学与21世纪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

第二，各种文化思潮都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列强入侵而传入的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形成冲击，影响了近代中国各种文化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同西方文化关系密切。20世纪初，随着孟德斯鸠，卢梭等西方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思想先驱也有了反响，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卢梭学案》和《民约论巨子卢梭学说》等介绍民约论，严复介绍英国进化论和自由主义思想。他们所介绍的西方思想迅速成为中国思想界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些思想与传统的民主，革命思想相结合，在时代发展的推动下，不断趋于激进。孙中山在考察西方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主张不仅要“冲决网罗”，而且要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1931年以后，无论是从宣传人数，宣传阵地，还是宣称范围，鼓吹的激烈程度，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逐渐达到高潮，渐成泛滥之势，与国民党蒋介石三民主义思想的蜕化与之有密切的联系。

“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即受到世界共产主义思潮，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也有比较紧密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等，也受到世界马克思主义反思思潮以及西方其他社会思潮的影响。可贵的是，马克思主义者较早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938年10月，毛主席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

自由主义思潮受西方文化的刺激更加明显。在甲午战败后，维新运动走向

高潮之际，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入国内，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杜威来华讲学以及胡适的传播，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广为流布。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序经认为：“七七”事变后，“在文化的精神方面，所谓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不只是一种口号，而且是一种事实。这可以说都是西化的结果。”他相信西化“不只可以抵抗我们的敌人，而且可以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大陆新自由主义者受西方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甚深，新自由主义开始由学术领域而政治领域，而意识形态领域，涉猎的范围越来越大，为西方价值体系在中国的推行起到重要作用。

保守主义思潮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刺激，并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不断演化。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吴宓，梅光迪，张荫麟，汤用彤等人，大多数留学欧美，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训练，颇受美国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文化上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冯友兰则于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其新理学思想体系。大陆以外的新儒家更是各有各的西方文化背景，大多接受过西方思想的熏陶。

第三，各文化思潮的相互冲突与融合贯穿各其发展变化的全过程。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辩，在自由主义思想萌芽的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主要表现为严复与洋务派的分歧。张之洞概括洋务派的主张，提出“中体西用”：“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sup>15</sup>。”以中学为内学，治身心，西学为外学，应世事。严复明确指出：“且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盖一人之身，其形神相资以为用；故一国之立，亦力德相备而后存。”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犹如生物体具有自己的体用，不可能在一个“体”上有其他的“用”。西方的根本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sup>16</sup>，”不能离开这个根本，不能仅仅学习

西方技艺,还必须改良政治制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战主要表现为胡适与梁漱溟,陶希圣等人的论争。1921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中国,印度,西方走的是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向。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的文化,印度文化是反身向后的文化,中国文化是调和折衷的文化,主张中国应该走孔子儒家文化的路。1923年,胡适发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批评梁漱溟的观点,提出中,西,印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只是快慢不同而已<sup>17</sup>。1930年代,陶希圣,何炳松为代表的本位文化派提出以中国本位为基础进行文化重建,无论中国的文化还是西洋的文化,只有适合中国需要,才有其价值。胡适批评本位文化派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妆<sup>18</sup>,”是保守心理在作怪,中国决不能改变向西方学习的方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战主要表现为殷海光与徐复观等人的论争。双方都肯定自由民主是中国文化的出路,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却存在根本不同。殷海光认为民主政治是讲理的政治,要以科学理性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石,而获得这种理性只能依靠逻辑和经验。以此为标准,他表示“痛恨一些人夸张‘历史文化<sup>19</sup>’”。而徐复观指出,民主自由在中国的生根需要中国历史文化的滋养,“民主政治,今后只有进一步接受儒家的思想,民主政治才能生稳根,才能发挥其最高的价值<sup>20</sup>。”不能因为儒家思想是古代的学说就否定它的现代价值,切断自由民主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论战并没有消除殷海光与徐复观之间的理论鸿沟,但论战增加了彼此的了解。

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从“五四”运动后期就已开始。在批判传统这一点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是同盟者,但自由主义者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与方法。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指出“主义”的危险性,它容易使人们“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他主张“少谈些‘主义<sup>21</sup>’”,提倡运用实验主义的科学原理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促进社会的渐进改良。李大钊致信胡适,指出主义的宣传

和实际问题的研究是相互作用的，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依靠多数人的共同努力，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把大家团结起来，主义的宣传是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希望。这场争论随着《每周评论》被查禁而告终。问题与主义之争预示了二者对传统问题的基本取向，它标志着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中国传统，解决中国政治社会文化问题时，所选取的根本方法和选择的道路具有很大的差异。20年代末到40年代，知识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社会史问题，农村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大论战，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系统论述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纲领。而胡适等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五鬼”闹中华，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sup>22</sup>，它们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在危害中国之列，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与观点渐行渐远。1948年前后，《观察》周刊围绕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等问题发表了数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储安平等自由主义者继续鼓吹和平改良的政治理念，宣称“自由主义含有消灭暴力的道德使命<sup>23</sup>。”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干之的文章《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批判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主张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长。1954年前后，对胡适的批判开始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到1955年3月，“全国省市以上报纸和全国学术性刊物大都发表了批判文章，总计在200篇以上。北京召开批判讨论会16次<sup>24</sup>”。批判固然有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通过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传统观的差异得到更加清楚的显示。

思想总是在对话中才得以沟通，提升与发展。20世纪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之间，针锋相对，似乎难以融通，但它们“都是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作为其思想的公共前提的”，因此也存在融合的可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港台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论战，双方态度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坚定不变。殷海光于1954年访美后，开始注意到现代化在物质技术文明背后的负面问题，开始思索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徐复观原本的态度通过论战也在发生变化，1957年，他发表文章表示理解自由主义。1965年，当自

由主义遭受批评时，他又发表文章为自由主义辩护。徐复观去世后，他的学生张灏称他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老斗士”。由此可知，自由主义者的代表殷海光认识到儒家思想中的开放系统，而修正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既定成见，现代新儒家的代表徐复观同时又被称为“自由主义的老斗士”。这种彼此的“同情”与修正，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思潮融合的趋势，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 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文化思潮不仅异常活跃。在对中国如何更好地实现现代化，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上，各文化思潮之间观点分歧明显。

当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认为：“世界经过工业化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尤其是中国经过一百多年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亦有最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这种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学，可以说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学。它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sup>25</sup>”。

而当代大陆新儒家自1980年代末开始兴盛，自称已逐渐从边缘走到中心。他们提出“儒化中国”的主张，认为“儒教与中华民族，中国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儒教兴则华族兴中国兴，儒教衰则华族衰中国衰”。“今天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伴随中国儒教的伟大复兴，不可能中国儒教式微衰落而中华民族复兴强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标志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国儒教的伟大复兴”。强调“只有在中国全面复兴了儒教，我们才能说中华文明得到了复兴<sup>26</sup>”。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意自由主义者的理念，也不同意当代新儒家的政治诉求及文化主张，指出当代大陆新儒学思潮的政治主张和制度构想，是一种融文化主张，政治理念和宗教诉求为一体的，具有“复古更化”色彩和“儒

化中国”的性质，政治保守主义，复古主义是其鲜明特征，让它在建设当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发挥积极作用，完全是南辕而北辙<sup>27</sup>。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实际上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是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和地区就会遭到巨大风险和灾难。”因此，对新自由主义思潮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sup>28</sup>。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新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不能认同，他们认为，通过对自由主义的反思，研究，倡导，可以丰富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主的学理资源，认为依法治国，权力制衡，公民权利等话题，在自由主义话语系统中的表达和讨论，比其他话语更适当和切题。虽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几乎一直指向激进的维度，但借重理性，依靠法律，妥协缓进的自由主义理路给人一种新的启示和希望<sup>29</sup>。大陆新儒家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也不予接受，他们认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只有“回归中华道统”，才能真正找到其源头活水。

在自然界中，事物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自发完成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而在人类社会中，人是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运动过程的主体，一切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离不开人们以选择为中介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这就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多样性。主体通过实践改造的世界，必然成为人所面对的现实世界，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已有文化传统的基础。同时由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既是生产的历史，又是交往的历史，任何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又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发展，它显示出社会主义的活力，同时也彰显出中国文化精神的生命力。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保持清醒的忧患意识，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基础，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只有这样，才能在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中保持定力，

同时也要从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的发展历史中汲取教训,善于吸取其他文化思潮的精华,继续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互鉴,引导人类实现更高的文化自觉,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贡献中华文化独特的理念。

- 1 严复:《论世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 2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2页。
- 3 周永林编:《邹容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 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 5 参见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9卷《抗日战争(1937-1945)》,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67页。
- 7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 8 《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5页。
- 9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0页。
- 10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
- 1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16日。
- 12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人民日报》2013年8月20日。
- 13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2014年3月27日)》,《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 14 严复:《论世变之亟》,王栻:《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 15 张之洞:《劝学篇》(1898年刊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 16 严复:《原强》,天津《直报》,1895年3月4—9日。
- 17 黄保定,季维龙:《胡适书评序跋集》,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91—407页。
- 18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第145号,1935年4月7日。
- 19 殷海光:《致王道》(1954年),《殷海光文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 20 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民主评论》第3卷第1期,1951年12

- 月16日。见黄克剑，林少敏编：《徐复观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 21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 22 胡适：《我们走哪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1929年12月10日。
- 23 杨人梗：《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观察》第2卷第11期，1947年5月10日。
- 24 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 25 刘军宁：《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 26 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国儒教研究通讯》创刊号，2005年第1期。
- 27 方克立等：《大陆新儒学思潮评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1日。
- 28 李瑞英：《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光明日报》，2004年11月9日。
- 29 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开放时代》，1999年第3期。

### 〔附記〕

謹以此文紀念矢野健一先生辭世一周年。

2004年，西北大學博物館收藏到一方日本遣唐使井真成的墓誌。由於井真成在中日雙方的歷史文獻中都沒有記載，而墓誌上又清楚地標明井真成之國號日本，這是當時所能見到的出土文物中日本國號的最早出現，一時引起中日人民的廣泛關注。矢野健一先生當時是日本專修大學文學院院長，他對此表現出高度的學術敏感，促成專修大學與西北大學於2005年1月在日本東京舉行了面向社會的學術研討會。我有幸參與了這次研討。日本社會和學者對研討會所表現出的熱情使我感到遣唐使井真成的精神在延續。研討會後不久，矢野健一先生又親臨西北大學，商談井真成墓誌的保護和復制問題，雖然沒有達成在日本專修大學保存一方復制墓誌的結果，但他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國政府在2005年將墓誌帶到日本展覽。此後矢野健一先生擔任了專修大學的校長，與西北大學開展了對遣唐使持續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績。不幸先生英年不永，韶華早逝，使我不勝唏噓，悵然若失。

衷心期待與矢野先生一起發掘的中日友好的歷史能成為一束不滅的篝火，讓先生在另外的世界感到溫暖，讓在這個世界的我們的胸懷更加包容，更加和煦。

謹んでこの文章を矢野健一先生の一周忌に献げる。

2004年，西北大學博物館は日本遣唐使井真成の墓誌を收藏した。井真成は中日双方の歴史資料に記載がなく、しかも墓誌に明瞭に井真成の国号が日本だと記されているために、当時確認しうる日本の国号が最初に見られる出土文物として、たちまち中日両国の人々の注目するところとなった。矢野健一先生は当時専修大学文学部長だったが、この墓誌の学問的意義を鋭敏に察知し、専修大学と西北大学双方に働きかけて、2005年1月に東京で広く一般市民にも開かれた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された。私は幸いにも、このシンポジウムに参加することができた。日本の一般市民や研究者がシンポジウムの中で放つ熱気に、私は、遣唐使井真成の精神が今になお息づいているかのように感じたもの

である。シンポジウムが終わってほどなく、矢野建一先生は再び西北大学を訪れられ、井真成墓誌の保護と複製のことを協議することとなった。専修大学が墓誌の複製を保存するという希望こそ実現されなかったが、中国政府が2005年に墓誌を日本で展覧することに先生は貢献されたのである。その後、矢野先生は専修大学学長に就任され、西北大学と提携して遣唐使について引き続き研究を深められ、少なからぬ成果を収められた。しかし思いがけず先生は壮年にして逝去され、私は悲しみに暮れることとなった。

矢野先生と共に築いた中日友好の歩みが、消えることのない篝火となって、彼岸にある先生をぬくもらせ、此岸にある我々の思いをもっと優しく、もっと温めて欲しいと、私は心より願わずにいられない。（張渭濤訳）